

· 山区开发 ·

制度抑制与贵州经济的发展

吴述松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贵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国家政策、区域分工和投资依赖国家的影响和产业以资源重工业为主、制度生产成本低、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的内、外因素影响下,贵州注重外来制度,忽视内生制度。结果是制度供给内在冲动差,发展空间小,不易产生适合本省经济发展的制度。并造成贵州产业结构二元化;制度依赖到制度抑制,形成经济发展战略被动;发展缺乏内在制度支持,经济难以高质量稳定增长和发展,制度抑制影响贵州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

关键词: 制度抑制;经济增长;制度选择;可持续发展;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贵州

中图分类号: F127.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457(2005)02-0146-07

Institutional repression and Guizhou economic development

WU Shu song (Economic College, Guizho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repression that makes Guizhou's economy lagg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 is impact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national policy, the area divided work, the investment depended major in the resource heavy industry, the highly cost institution made making the institutions lack which make Guizhou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aliened institutions and a little of the endogenesis ones. Guizhou can't give birth to the appropriate institutions. It results in that Guizh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ualistic, the development stratagem is passive. The local institutions can't support the economy steadily developing. The institutional repression drives Guizhou's residual growth ratio at low level.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pression; economic growth; institution choo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 making the residual growth ratio; Guizhou

贵州是“江南煤海”,煤产量全国前列;磨料之省,磨料、磨具占全国一半产量,磨料、磨具出口超过全国总出口的60%;铝业之都,电解铝全国第一;有亚洲最大的磷化工基地。但是,与西部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发展落后,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全国末位。是什么阻碍了贵州经济发展呢?新制度主义(Neo Institutionalism)认为,无制度变迁,也无经济发展。笔者则认为是制度抑制(institutional repression)使贵州难以孕育、产生适合本省经济发展的制度和高级模式,并导致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差。贵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1)国家对贵州的军事工业起点配置,暗含了贵州重工业发展道路;(2)国家投资铝、镁、磷的资源型开发,固化了贵州重工业道路,加深投资依赖,限制分工和产业分离,制约产业发展;(3)国家对黔资源型重工业开发政策束缚了贵州制度发展空间;(4)造成资源型重工业是贵州优势产业的假象,该产业的商品生产边际成本相对低,贵州以此来安排商品生产,难以进行其他制度选择。因此,贵州经济走上了一条由依赖到抑制的发展道路:国家对贵州投资影响产业发展,国家产业、区域分工影响制度发展,并导致制度抑制。在内部制度惯性和外部制度抑制双重压力下,贵州制度选择“权利不足”。结果是,投入产出效率差,经济增长不平稳,缺乏内在动力,与东、西部的差距拉大。

收稿日期: 2004-12-31 修回日期: 2005-03-22

作者简介: 吴述松(1971-),男,贵州天柱人,苗族,贵州大学2002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讲师,从事经济发展研究。

1 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刘易斯、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 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 甚至阻碍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规则体系, 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框架, 这个体系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 制度约束、引导人的偏好, 人并非只做他们喜欢的事, 也要在制度下做不想做的事;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的激励结构; 制度安排决定了各种类型的组织的活动边界。“如果一国的制度结构激励生产性活动, 该国经济发展就快; 如果一国制度激励非生产性的活动, 该国经济发展就慢”^[1]。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都取决于制度的变迁。制度不是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是政府为吸引投资, 在行政、税收上给予的便利、减免措施, 有短期性和具体性。优惠政策不一定达到政府的预期目的。因被模仿而失去优势; 因执行难而打折扣。

斯密、马克思、李斯特十分关注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新古典主义不考虑历史、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是不正确的。不少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对经济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的诠释, 比新古典经济学视野更广、更贴近现实。新古典主义研究范围仅仅涉及商品供给与需求的狭隘领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一般都称为“政治经济学”, 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虽未标出“政治”一词, 但是它是从多方面因素(经济和非经济)来分析增长和发展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 因为德国历史特殊性, 拒不承认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普遍的共同规律, 只有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马克思^[2]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正是人类社会制度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

不同制度导致不同增长, 产生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的提出, 解答了为什么不同地区会产生经济增长差异这个问题。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 就此问题纷纷提出了各自看法, 有资源禀赋说, 人力资本说, 中心外围依附说, 二元经济说, 两缺口说, 恶性循环说等等。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给该问题一个满意的解答。众所周知, 经济增长与吸引投资的能力、分工程度、产业结构演变、技术进步、所有制变迁、交易费用、宏观管理政策有关。那么影响、决定这些因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新制度主义认为是制度。一般地, 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人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 技术进步是人为降低直接生产成本的努力。而且技术、分工、所有制结构、交易费用、产业结构、投资吸引力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外生变化, 它由制度演进提供的激励与保障所诱致。因此, 增长率差异是经济的表面现象, 而根本在于制度差异。我们把因为制度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差额称之为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从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我们可以得出: (1) 为什么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不再是投资而是制度支持。“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3]。这是党中央西部大开发英明决策, 也是对过去西部政策抑制的调整, 更是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经验总结。西部大开发给贵州经济发展的信号是: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制度创新, 传统投资扩张性方式已经不适合 21 世纪贵州发展的需要。(2) 制度是个综合概念, 任何单一优惠政策或者行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贵州经济增长的质量。(3) 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为贵州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济学家积累了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量证据。主张重视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家对早期过分强调物质资本积累促进增长提出了疑问, 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清楚。究竟是物质资本积累引起增长, 还是增长引起物质资本积累? 对美国和西欧研究表明, 产出中有一部分不能用物质资本投入来说明, 归因于“不可解释的余差因素”(unexplained residual factor)。舒尔茨率先揭示了不可解释的余差因素, 把它称为: 余值增长率。这个余差因为人力资本不同而产生。实际上,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 人力资本只是众多不可解释因素之一。新制度经济学从社会整体看待不可解释的余差因素。社会首先是习惯、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的总和, 由此派生投资制度、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调整制度、分工制

度等等。因此,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表现在于增长率余值差异,而本质在于制度差异。我们以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来揭示增长与投入不相称的原因,发现了不可解释的余差因素的本质。不同制度引起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与地区的资源、历史、人为努力、市场选定相结合的制度所引起的余值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稳定而高质量,拥有内在发展动力而在吸引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方面变得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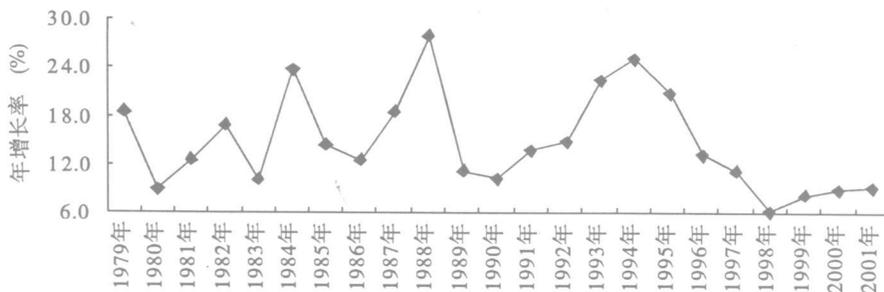
经典理论对贵州经济发展启迪是:找到适合的制度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如同科斯所说:“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4]。

2 约束贵州经济发展的制度因子

舒尔茨批评了刘易斯的“无限供给剩余劳动”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经济刺激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那么,贵州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对经济刺激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制定有利的制度呢?是因为贵州受到制度抑制。其理由如下:

其一、军工投资束缚贵州产业孕育,投资依赖导致产业依赖。解放前的贵州,基本上没有工业。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为国防安全考虑,国家在西部地区进行“三线建设”。依靠国家投资,贵州有了自己的工业,工业和经济也因此快速发展,并且成为增长极。1990年,贵州三线项目单民品产值13.9亿元,是1985年的2.3倍,高于同期的2.1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但是,这些军工项目难以融合到当地经济中,其自身也没有发展形成产业链,因此,对贵州带动作用并不大。这些来自中央的项目既不与当地的资源结合,也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们是贵州经济、制度的孤岛。改革开放后,这些项目逐步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因为难以分工,难以适应市场,成为贵州的包袱,制度创新的一个障碍^[6]。2001年拥有总资产151亿多元,5万多专业技术人员的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军工基地已经成为时下贵州企业改制的难题。

其二、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国家投资就集中在资源型重工业,延续了国家在贵州军事重工业投资的历史。基于贵州的一穷二白,国家投入就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投资变化影响贵州经济增长速度,也影响着贵州的制度和产业选择。“六五”时期,贵州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5.5%,全国为14.7%;“七五”期间贵州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5.5%,全国为15.6%;“八五”贵州为19.6%,全国为24.8%^[6]。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国家对贵州的投资和财政转移增加,又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增长加速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会出这种差距波动呢?一是军工企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开发靠国家投资,贵州对国家投资的依赖性大于以轻加工业为主要的沿海地区,国家增减对贵州投资的边际影响大于对东部投资的边际影响。因此,国家投资的变化,对贵州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和反面加速作用。二是国家投资形成了贵州产业以资源重工业为主,产业形成和发展依赖国家投资。因为重工业投资乘数小,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小。贵州1995~2000年均增长率在西部10个地区倒数第三^[7]。三是经济发展欠平稳。与国家投资相伴的是国家对贵州制度的供给,包括管理制度、产业制度、制度空间、分工等。也就排斥了贵州内生制度产生和演变。它揭示了贵州经济不能稳定发展的根源,说明促进、稳定贵州经济发展的制度还未成熟(见图1)。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统计年鉴2001》

图1 1979~2001贵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Fig. 1 1979-2001 Guizhou GDP annual growth ratio

其三、这样, 贵州不得不走上“等、靠、要”的依赖道路^[8]。国家对贵州的资金扶持, 对经济促进作用有限。资源型重工业被马克思称为生产资料部类,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第三产业而远离重工业生产资料部类。难以分工的资源型重工业对贵州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也越来越小, 这恰恰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障碍, 贵州的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过高和第三产业表现低, 呈现经济结构总体差。表 1 的数据表明, 贵州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27.3%, 在西部 11 个省、市、区中排名第二, 与最低的青海相差 12.7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仅占 33.7%, 与最高的西藏相差 12.2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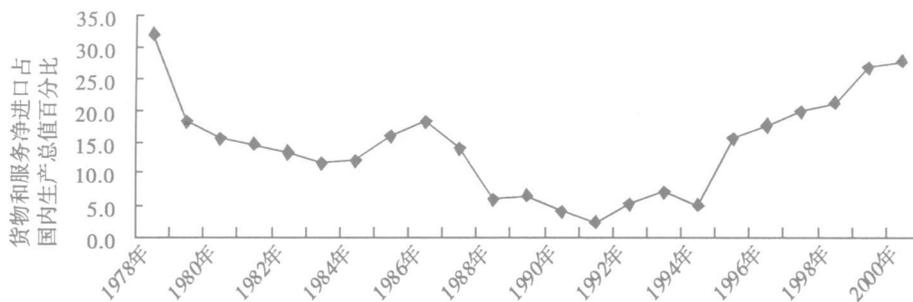
表 1 2000 年西部 11 个地区产业比重对照

Tab. 1 11 - region' s industry proporton comparison in the year of 2000

省 份	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
贵 州	27.3	33.7
四 川	23.6	34.0
内 蒙 古	25.0	35.3
甘 肃	19.7	35.6
新 疆	21.1	35.9
广 西	26.3	37.2
宁 夏	17.3	37.5
陕 西	16.8	39.1
重 庆	17.8	40.8
青 海	14.6	42.1
西 藏	30.9	45.9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统计年鉴 2001》。

西部大开发后, 国家加大了对贵州的财政支持力度, 但是, 即使国家的转移支付逐年增加, 却相应地用来购买省外的商品 (包括对重工业投资的资本品和居民消费品), 这是贵州产业结构差造成的, 国家财政投入只是在贵州打了一个转, 又回到省外, 带动效应有限, 图 2 反映了这种趋势, 随着贵州经济的开放、发展, 其消费、投资品缺口也越大, 由 1991 最低点 2.2%, 逐年增加到 2000 年的 27.9%。原因是资源型重工业所需的技术、设备等等需要从外省购买, 相应的外省购买也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统计年鉴2001》

图 2 贵州货物和服务净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趋势图

Fig 2 Guizhou goods & services net imported proportion trend

其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把贵州产业限制在交通、通信、能源 (这些产业, 贵州既无资金实力, 更无技术力量, 不得不仰仗国家投资, 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控制在国家手里) 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国家产业分工格局下, 贵州产业制度受双重压制, 一是从宏观上, 国家规定了贵州产业发展路径和方向, 贵州只能在国家产业框架下做些修修补补, “制度安排决定了贵州经济活动边界”; 二是微观上, 贵州财力有限, 不得不千方百计组织国家规划下的产业, 争取纳入国家的“盘子”, 以望国家资助, 制度发展无选择权利, “人并非只做他们喜欢的事, 也要在制度下做不想做的事”。这样, 依靠国家投入形成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大企业, 虽然对贵州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 但却产生以下结果: 一是制度创新投鼠忌器, 更受审批的有限权利制约, 要层层上报到中央, 制度生产成本低, 影响制度演进。特别是“011”、“061”、“083”三大军事工业的

制度改革, 贵州难有作为。二是这些资源型重工业难以分工, 资源型产业的下游产业在省外, 限制了本省下游产业发展。“东部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作先导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 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产业、输出产品、拓宽市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必须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面”^[3]。三是一部分利润归国家所有, 资本鸿沟限制了贵州产业重组、选择。贵州的电煤与直接外卖煤的矛盾就凸现了这问题。贵州大部分煤矿由地方投资, 收益归己, 而电厂是国家的, 贵州只有股份小收益, 地方煤矿当然愿意高价外卖。四是基于上述理由, 贵州注重外来制度, 忽视内生制度和制度选择。以药业为例, 贵州中药、民族药发展迅速, 1990年贵州还没有民族药业, 1995年民族药企业达到 70 户, 产值达 3 246 88 万元, 占当年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4%, 1998 年 7.31 亿元, 1999 年 10.27 亿元, 2002 年, 民族药业总产值近 20 亿, 年均增 80.2%, 有一家上市公司。约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41.0%。1989 年贵州省医药工业总产值 1.13 亿元, 2003 年 50.84 亿元以上, 年均增长 31.2%。但是即使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本土产业, 因为不是中央支持西部发展的六大产业, 最近才引起管理当局的重视。

其五、资源开发, 要求以重工业或者大型企业为主。贵州资本有限, 投资则以国家为主。表 2 反映了这种趋势。随着中央投入的增加, 国有经济占全部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8], 并约束贵州制度创新。

表 2 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

Tab.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invested on the fixed assets

年 份	国有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
1997年	60.6
1998年	62.0
1999年	63.1
2000年	64.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其六、经济结构和对外交换局面使贵州产业发展制度无从选择。“相对价格是在市场下一种商品能够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比例。在消费者最优点, 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估价(以边际替代率衡量)等于这两种商品的市场估价(以相对价格衡量)”^[9]。这句话说明,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与它的资源禀赋或者生产能力有关。在投资和技术上, 贵州初煤生产比洗精煤生产有优势, 生产煤比发电有相对优势。据 2005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贵州省经贸工作会议预计, 2005 年, 贵州煤产量将突破 1 亿 t; 地方中小煤矿占 80%, 重点煤矿占 20%, 但是需要高投资、高技术的洗精煤, 国家投资的重点矿却占了 900 万 t 中的 500 万 t^[10]; 电厂建设则依赖国家投资, 因为电的增值税是煤的 4 倍, 西电东送是贵州省政府的大局, 但是在相对优势的驱使下, 贵州还是把煤大量卖到外省, 哪怕本省电厂也需要煤, 甚至缺煤。为什么呢? 煤在贵州丰富, 相对价格也低, 省内价 135.5 元每吨, 可是贵州电厂仍嫌贵, 而江西则乐意以每吨 350 元购买贵州煤炭^[11]。为了阻止贵州电厂与外省电厂对煤的相对价格估价差异导致煤外卖, 据贵州日报 2004 年 12 月 16 日报道, 省经贸委就下文要求, 凡是没有完成省内电煤供应任务的国有大矿和煤炭经营单位, 一律停止外运。据测 2005 年, 贵州煤炭供应的紧张状况继续存在, 但是在相对优势生产商品的逻辑下, 仍将 40%, 4 000 万 t 左右的煤调出省外^[11]。另外煤、电是贵州优势的资源型重工业产品, 煤、电相对价格就是在省内比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低, 导致贵州的平均销售电价全国最低^[10]。显然, 资源优势的产业尚且如此, 其他产业可想而知, 贵州只好依靠国家来发展资源型重工业, 至多是“多害相较取其轻”的不得已策略——其他非资源优势产业因为相对价格的原因, 更没有优势, 更没有竞争力。在资源型重工业的历史惯性和供给曲线由边际成本决定的原理驱使下, 贵州不得不骑虎难下地发展资源型重工业, 制度也因此受限制。

其七、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的活动, 贵州制度空间狭小, 导致制度依赖。1986 年 4 月,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贵州等 1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经济、地理和民族等因素来看, 属于西部地区。省政府经济发展政策无不以中央政策为导向, 约束贵州制度发展。自 2000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各省、市、区, 为争取

加快发展, 纷纷出台各种应对政策和种种优惠措施, 但是都为对应中央对西部的 6 个方面 (基础产业、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教育、开发带动战略和国家实施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 要求。《中国西部统计年鉴 2001》第一篇“西部发展专文”也表明, 各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莫不在此框架之内, 其他文献检索也是如此。

3 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低, 影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扩大投入是经济发展的首选, 这要求有资本积累和融资渠道。为改变收益递减规律, 还须有先进技术。但是, 贵州的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难以得到资本投入和技术的支持。在新制度主义看来, 技术、制度不是外生的, 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 并且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下面分别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吨煤工业产值、非公有经济投资、电力消费弹性来分析贵州经济发展的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制度抑制, 导致贵州在投入产出、分工、吸引投资、制度促进技术等方面, 总体发展落后, 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低。从图 3.4 呈现的趋势看, 贵州投入的边际贡献递减, 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下降速度比广西快; 吨煤工业总产值连续多年不到广西的一半。这表明, 受制度抑制影响, 贵州制度差异余值增长率低, 经济增长质量差; 从吨煤工业产值看技术进步, 受制度约束大的贵州显然不如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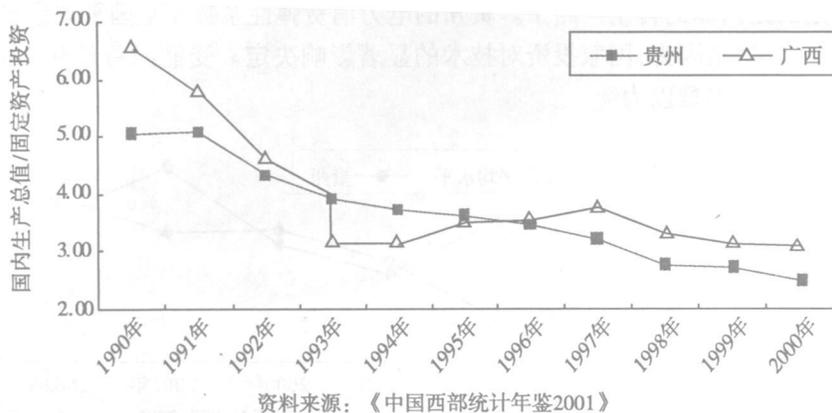


图 3 贵州、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图

Fig 3 Guizhou Guangxi GDP/FIA trend/FIA: the invested on the fixed ass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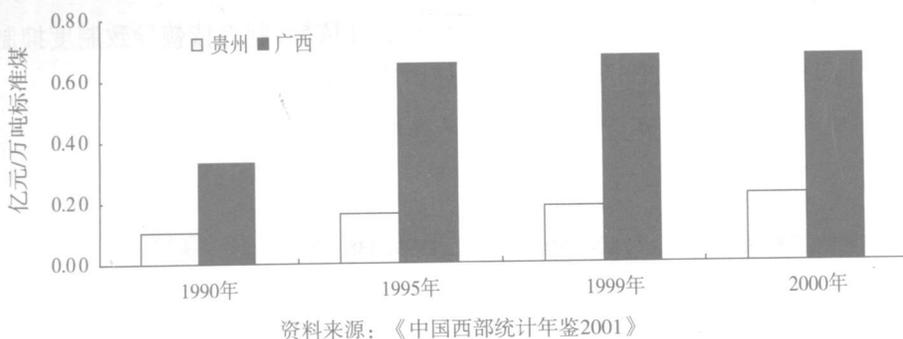


图 4 贵州、广西吨煤工业产值 (单位: 亿元/万吨标准煤)

Fig 4 Guizhou Guangxi industry value / ton coal (unit: hundred million yuan / 10 - thousand standard coal)

图 5 是 2000 年贵州非公有制经济投资比重在西部地区的排序。贵州的非公有经济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 28%, 在西部 10 个地区中排第 4 位, 说明贵州吸引资本能力弱。因为资源型重工业的垄断性、难以分工和高投入高风险, 也反映了贵州难以制定吸引投资政策, 贵州的投资扩张发展模式瓶颈已经出现。一般地, 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素除了资源就是制度, 制度决定企业的交易费用和发展前途, 鉴于资

源储量不能变化的客观性,依据本地经济规律制定的制度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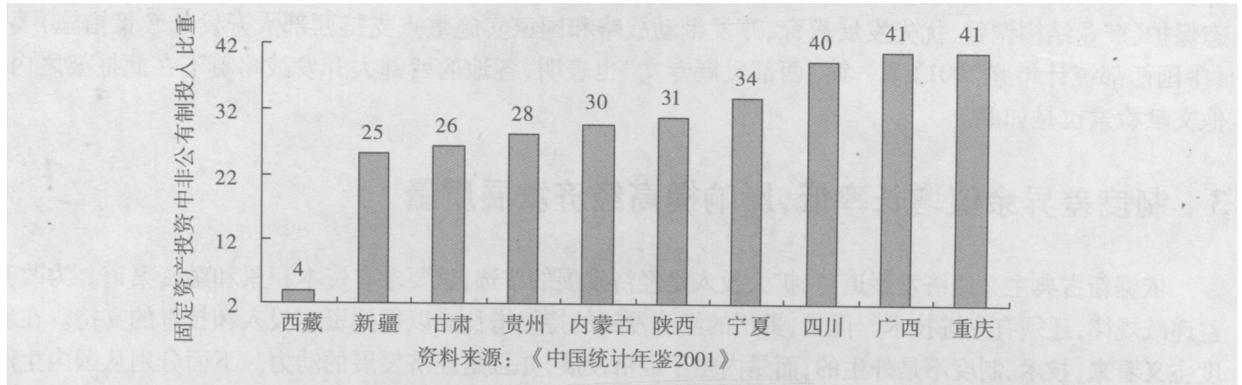


图 5 2000年西部10地区非公有经济投资比重排序

Fig 5 10 - region's non state owned investment proportion list in the year of 2000

图 6反映了贵州高能耗的经济增长路子,如果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反映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指标,计算公式为: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 电力消费增长速度 / 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变小,说明技术进步,走的是内涵的再生产路子。贵州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差,呈递增趋势;而且贵州的变动趋势大,这是因为,国家投资对技术的显著影响决定。受能源总量和环境保护制约,走高消耗、高投入的增长路子也将难以为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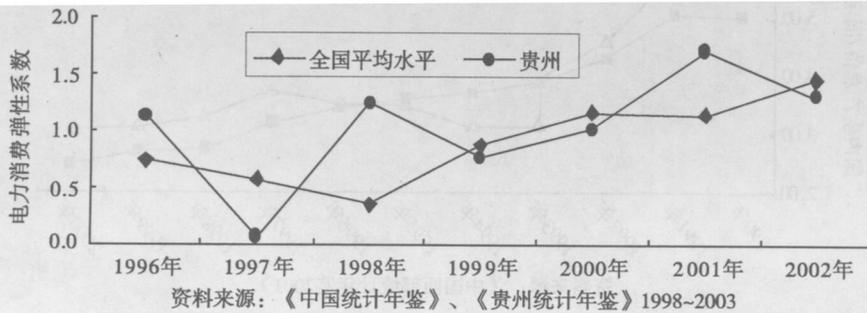


图 6 全国、贵州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图

Fig 6 The electric consumption elasticity coefficient trend of Guizhou and nation

总之,国家对贵州投资,导致产业依赖,产业发展导致制度依赖,制度依赖导致制度抑制,并导致制度差异异值增长率低下,这是影响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致谢:本文吸收了经济学院王朝科教授和学报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338-356
- [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第2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8
- [3] 杨 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32-134
- [4] Coase R.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2. 35.
- [5] 邱晓华.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年鉴(1993)[R].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4. 35
- [6] 陈栋生. 西部经济崛起之路[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18-56
- [7] 邱晓华. 中国西部统计年鉴 2001[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130-135
- [8] 马 洪.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2002[R].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339
- [9] N 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M]. The Dryden Press &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 456
- [10] 曾 明. 今年煤电运力依然紧张[N]. 贵州商报, 2005-01-12-09.
- [11] 何忠平. 贵州煤遭遇“质价危机” 17电厂“集体上谏”[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9-02-31